



论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

孙德刚

[摘要] 目前学界通常采取二分法,将权力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嵌入式权力与非嵌入式权力等,但未将一国权力大小的衡量纳入到立体多维的指标中加以考察,也忽视了军事力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对该国权力大小的影响。本文将权力分为权力资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四个层面,考察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权力是个立体多维的范畴,既存在于静态的结构中,又存在于动态的关系与运用中;第二,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权力的上述四个层面,是判断部署国权力大小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在全球关键地区部署与该国外利益保护相称的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军事基地;海外军事存在;权力投射;权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4)05-0022-28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4.05.004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但学界对权力类型和影响因素的探讨仍显不足。一般认为,权力可分为硬权力、软权力与巧权力;还有学者认为,权力可分为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嵌入式权力与非嵌入式权力等。^[1]上述权力分类往往忽略了一国权力在空间上分布的差异等对该国权力的影响,亦即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包括位置和规模)在一国权力中同样扮演重要作用;权力可分为潜在权力与现实权力、硬权力与软权力、基本力与投射力、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等不同类型。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权力的四个层面——权力资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拓展权力是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隐性逻辑。

一、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资源的影响

权力是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理念,权力概念贯彻在政治、政策和行政现象分析的始终。^[2]

如伯兰特·罗素所言:“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3]美国地缘政治学专家斯皮克曼也指出:“没有驱使物体移动的机械力,就不会有技术;没有驱使人们行动的政治权力,技术就不能为社会服务。”^[4]按照语境不同,权力可分为国内政治语境下的权力(权力分配和运行)与国际政治语境下的权力(安全和利益)。本文主要探讨国际政治语境下的权力,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海外军事基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主权国家国际权力的大小。

衡量一国国际权力的大小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视角不同,衡量与分析的标准也差异甚大。本文将权力视为动态、立体的概念,认为衡量一国国际权力的大小,主要基于四个既相互依存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权力资源,第二个层面是权力构成,第三个层面是权力投射,第四个层面是权力运用;海外军事基地渗透到上述四个层面,对一国的权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研究”(13CGJ042)的前期成果,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4PJC092)的资助。

权力资源是衡量一国权力大小的第一个维度,是一国的潜在权力,一般包括该国面积、人口、资源、经济规模、工业设施、武器装备、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资源不同于权力,充其量只能算作潜在权力,因为它需要通过一定中介被主体掌握和运用后才能发挥力量。例如,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软权力资源丰富,但这并不是软权力本身。^[5]同样,军事资源不能等同于一国的军事权力,前者在军事上构成了军事潜力,后者是军事实力;前者成为一国权力的重要支撑,后者为一国权力的体现。军事资源是一种军事潜力,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过动员可以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在一定时期内”,还是“经过动员”,都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满足转化的条件,而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意味着在较短时间内将军事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军事权力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资源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资源等,在地缘上也可分为国内和国际资源,后者包括海外投资、贸易、政治和军事存在等。海外军事基地是一国的海外军事资源,其既是保护大国海外利益的手段,也是其海外资源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危机爆发后可以转化为军事权力。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世界主导权,其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成为重要权力资源。截至1949年,美国控制了曾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军事基地,包括马绍尔群岛、卡罗琳岛、马里亚纳群岛、库塞群岛、帕劳群岛、旁纳裴群岛、特鲁克群岛、雅浦岛等,虽然这些岛屿陆地总面积仅829平方英里,人口仅8.5万,却从太平洋北部向赤道地区延伸了1200英里,从东向西延伸了2500英里,美国通过这些军事基地保留了这些领地的海空托管权,支配的海域面积达250万平方英里,成为美国在二战后支配全球的重要权力资源。^[6]另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0年美国在国外军事基地的重置价值多达100多亿美元,在海外陆地上的军事基地的重置价值达3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重要的权力资源。^[7]海外军事基地越多,海外军事资源越丰富、价值越大,其海外权力资源就越多,军事资源转化为军事权力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权力资源是一国权力的基础,海外军事基地是该国海外权力资源的基础,也是一国权力资源的组成部分。

二、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构成的影响

除权力资源外,海外军事基地还会影响一国的权

力构成。目前学界对权力构成的研究较为系统,如约瑟夫·奈将权力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前者主要是一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通常是有形的、物质的,旨在利诱和胁迫潜在敌人;后者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形象、动员力、议题设置能力和政治制度等无形的、非物质的因素,旨在吸引和同化他国。^[8]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利用美国的硬权力,笃信军事力量。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曾经指出:“五角大楼经常把国务院及外交官视为绥靖主义者”,小布什政府甚至把外交和文化手段等软权力视为一种软弱的表现。^[9]硬权力通常是有形的,主要是因为其更容易通过指标加以衡量;软权力通常是无形的,主要是因为其难以找到测量的指标并进行量化。硬权力衡量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防开支、贸易额、GDP总量、经济规模和军事战斗人员人数等,相比之下,软权力的衡量标准差异甚大,如文化亲和力、政府效率、外交活力、领袖精英的人格魅力、宗教与意识形态的感染力、一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教育水平等。

海外军事基地属于硬权力范畴,但是无论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提出的硬权力与软权力,还是乔治敦大学克莱因教授(Ray Steiner Cline)提出的权力计算公式 $P_p = (C + E + M) \times (S + W)$,^[10]都忽视了一国硬权力中军事力量在空间上分布的差异对权力的影响,如同样的军事力量如果分布在国内或分布在海外对这些国家构成的影响。相同性质和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在海外比部署在国内更有助于其提升国际权力,这是美、俄(苏)、法、英、日等大国迄今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的重要动因。判定一国的硬权力,不仅需要看其军事、经济和科技等要素及其构成比例,而且需要观察其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军事力量部署在国内与部署在国外);海外军事基地是影响一国硬权力的重要函数。

近代以来,海外军事基地对一国硬权力的影响可以从更多实例中找到例证。例如,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尽管俄国总体军事实力超过日本,但是其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位于欧洲的军事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向东北亚地区集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战败;^[11]二战时期,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其向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部署军事力量的欲望逐步膨胀。1940年3月12日,苏联与芬兰签订《和平条约》,其中第四条规定:“为了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以保卫芬兰湾入口处免受侵略,芬兰共和国同意将汉科半岛和东、南方直径五英里内,西、北方直径三英里内的水域以及附图上所指明的位于该处的岛

屿租借给苏联,为期三十年,每年偿付八百万芬兰马克。为了保卫海军基地,苏联应具有在该地驻扎必要数目的海军和空军的权利,费用由苏联自己负担。”^[12]二战结束后,经过近15年的经济发展,苏联的综合国力进一步上升,其向全球部署力量的动机越发强烈。20世纪60年代初,2.2万人苏联军队部署在古巴,以帮助古巴建立军事防御体系,并在古巴建立了庞大的海军基地,增强了苏联的海军权力。1962年9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讲话指出:“如果苏联在古巴建立强大的进攻性军事基地,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极大危害”,^[13]这表明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基地提升了其在西半球的威慑能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苏联印度洋中队的舰艇数量增加至30余艘,这些军舰主要依赖越南的金兰湾和岷港两处军事基地进行休整并获得补给。同样,苏联租用越南上述两处军事基地后,改变了与美国争夺南中国海战略要地的劣势,大大提升了苏联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实力,也使苏联印度洋中队的军事部署能力增强,帮助苏联实现了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和印度洋全球四大洋战略。^[14]

欧盟也十分重视硬权力的海外部署,其《21世纪初安全战略报告》将欧盟的硬权力载体分为四个等级:(1)欧盟军事设施;(2)部署在欧盟海外领地上的军事基地,如英国在直布罗陀和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3)部署在外国土地上的军事基地,如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4)战略舰艇,如欧盟成员国部署在公海上的航空母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等。^[15]

此外,地区大国在军事行动中也很重视海外军事设施。例如,1976年以色列军机在乌干达执行营救人质的“恩德培行动”(即“霹雳行动”)后,返回途中曾使用了肯尼亚的军事设施;^[16]21世纪初以来,印度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了反恐基地;日本在吉布提建立了反海盗基地等,都拓展了部署国的硬权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政治和经济代价高昂,但是大国频频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主要是因为其能够有效提升一国的军事硬权力,也使一国的力量出现倍增效应。国家的军事力量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广阔的水体和巍峨的山脉往往成为天然阻隔,使大国在干预遥远地区事务时具有不利条件。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地缘劣势。例如,美国是西半球国家,但是由于其在关岛、冲绳、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对于西太平洋的事务具有较强干预能力。其不仅使一国增强威慑、遏制和干预地区事务的能力,而且成为基地使用国重要的军事维

修、军火储存、军事训练、后勤保障、情报搜集等场所。^[17]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冷战,国际权力斗争的焦点大都是海上大国与陆上大国的较量,海上军事实力成为西方海洋大国“征服”陆上强国的重要手段,如美、英等海上大国与德国、苏联等陆上大国的较量等。军事硬权力的增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部署海外军事基地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伴随军事科技的发展,战斗机打击半径增加、核动力潜艇的升级、导弹射程的增加、军事卫星的使用,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能力不断增强,成本也不断减少。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的B-2轰炸机从本土密苏里的怀特曼(Whiteman)空军基地出发执行轰炸任务,往返线路为1万英里,需要30个小时;2001年阿富汗战争时期,部分美国B-2轰炸机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出发,单程3000英里,往返6000英里,往返仅15小时,而美国轰炸机从海湾军事基地出发前往阿富汗执行轰炸任务时,单程仅700英里,往返1400英里,海外军事基地大大增加了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机动性。^[18]

三、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投射的影响

海外军事基地除影响一国权力资源和权力构成外,还对权力投射产生重要影响,而投射力又是判断一国权力大小的重要参数。本文第一和第二部分所提出的权力资源和权力构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权力要素,而影响权力大小的还有动态的投射力这一要素。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指出的,权力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实际上,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权力也存在于关系之中,投射力成为判断一国权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例如,蒙古帝国和中国明朝曾经依靠强大的船只增加对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长距离投射能力;在13—16世纪的地中海,各国往往利用桨船(Oared Galley)投射力量,增强本国权力投射能力。^[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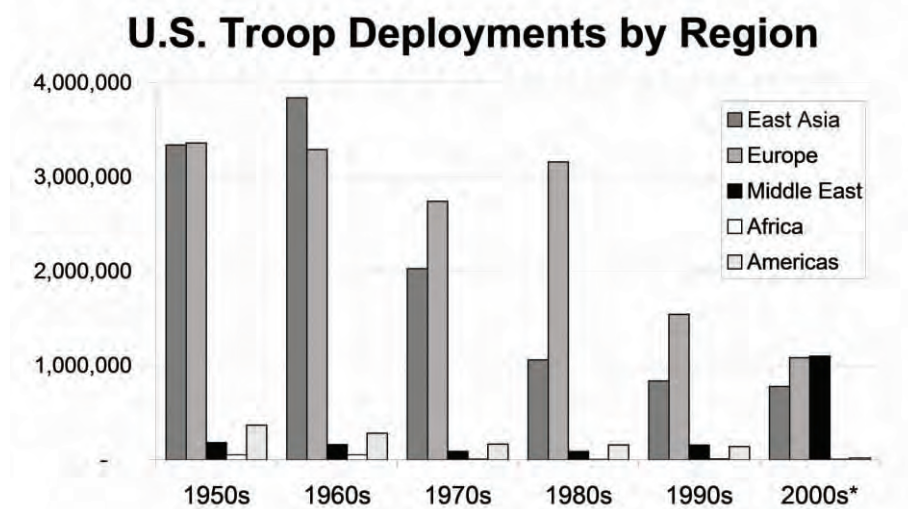
如果说权力的核心之一是军事投射力,那么军事投射力实际上就是国际实体克服地缘上的劣势,将军事力量投射到相应地点以达到政治目的行为。投射力的大小与地缘距离呈反比,与投射强度呈正比。正如斯皮克曼所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于一国的安全起到基础性意义。它决定并影响了所有其他因素,因为一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气候,气候又影响了一国经济结构;地理位置还决定了一国潜在敌人和盟友,甚至还决定了该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作用。”^[20]投射力彰显了一国力量的机动性(mobility),分为陆

上、海上和空中机动性。陆上机动性主要依靠铁路、公路及其陆上交通工具。一战前后铁路的兴起大大提升了陆上强国的军事力量机动性与投射力；海上机动性主要依靠各种舰艇、航母、潜艇、以及对海上港口和水道的控制；空中机动性主要依靠导弹、战斗机和军事卫星等。^[21]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海上强国比陆上强国的军事投射力更强，空军力量比海军力量的投射力更强，进攻性力量比防御性力量的投射力更强。海外军事基地越密集，驻军人数越多，地区军事投射力越大。本文提出，一国的军事投射力=投射强度(军事硬权力基本构成要素+软权力构成要素)×权力机动性÷投射时间。

一国的国际投射力包括文化投射力(如法国政府在海外推广法语机构)、政治投射力(如一国在建交国

设立使领馆)与军事投射力(如海外军事基地)等不同类型，洲际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与航空母舰的开发提升了一国的远程攻击能力，而海外军事基地也大大提升了一国的军事投射力。中国的七大军区管辖范围全部在中国主权范围内，而美国的六大军事司令部责任区覆盖全球(包括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亦即美国将全球各地均视为战区，军事投射力远超过前者，其军事硬权力也超过前者。当然，由于战略目标不同，大国在全球投射的重点也不一样。从图1可看出，冷战后，美国全球军事部署总体下降，尤其在东亚和欧洲的军事部署明显下降，而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在上升，使之成为并列于东亚和欧洲的三大战略地区之一。

图1 美国在东亚、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驻军人数的变化：1950—2005



Source: Tim Kane, "Global U. S. Troop Deployment, 1950—2005",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6/05/global-us-troop-deployment-1950-2005>, 访问日期:2014年5月25日。

近代以来，美国十分重视军事投射力。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向欧洲和亚太地区派出的远征军(组建于1917年)，主要是为了克服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投射美国的军事力量。二战结束后，美国部署在比利时、英国、希腊、德国、荷兰和土耳其等国军事基地的核武器，使美国投射核力量、向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获得了前沿阵地；美国在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通讯设备及高科技武器增强了对苏核打击的可信度。美国在上述国家的军事基地克服了其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劣势，增强了核攻击能力。^[22]正如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所言，增强一国对潜在敌国遏制能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在潜在敌国的周边地区部署“据点”

(Strongpoint)，如战后美国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提升了美国对欧亚大陆国家的遏制能力。^[23]1977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探讨美国在地中海的军事战略时，明确提出了“当威慑失败时，美国将向地中海地区投射足够多的力量，以产生有效防御能力。”^[24]1991年，美国空军的口号是“全球大国，全球投射”(Global Power, Global Reach)，^[25]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球投射能力”对于维护冷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2004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费斯(Douglas Feith)就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指出：“我们正应对全球性威胁，因此我们在制定地区政策时必须要有全球战略，采取全球性行动；我们必须增强从一个地

区向另一个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基于全球视角管理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力量。”^[26]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进一步强调增强全球军事投射力的重要性。2012年1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指出:军事基地是投射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旨在增强军事基地使用国的遏制能力。为有效遏制潜在敌国并阻止它们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须在那些挑战美国的介入和自由出入的地区保持远程投射实力。因为在这些地区,“老谋深算的敌人可能会采取非对称性手段,包括发动电子战和网络战、使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依靠先进的防空力量、布雷和其他措施,使美国的权力投射的效果更加难以判断。如中国和伊朗会继续采取非对称性手段削弱我们的权力投射能力;先进武器和技术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也会削弱我们的权力投射能力。因此,美国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增强我们在敌人反接近和区域封锁(Anti Access/Area Denial)的情况下,更加高效地采取军事行动,包括‘联合介入’(Joint Operational Access),增强美国水下攻击能力,发展隐形轰炸机,增强导弹防御和以太空为基地的应急能力。”^[27]

四、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运用的影响

海外军事基地影响权力资源、权力构成和权力投射,亦影响权力运用。权力运用是影响权力大小的第四个层面,涉及管理艺术、领导才能、各种权力的整合等诸多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和张弛在对软权力进行分析后指出:“国际政治中的软硬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感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同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表现为软力量,又可以表现为硬力量。”^[28]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硬权力与软权力常常相互交织、相互支撑,从而出现了硬权力的软使用(如军事力量用于国际维和、赈灾、救援,以提升国际形象和软权力),以及软权力的硬使用等交叉权力。军事软权力概念实际上并非权力的构成,而是权力的运用,探讨的就是硬权力的软使用层面。^[29]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和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提出的巧权力,实际上是在权力构成(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权力的有效运用及其效率是判定一国权力的重要因素,包括综合运用经济、军事、外交、政治、法律、文化、国际组织等各种手段,以达到收益与成本的最优化。

影响一国权力运用的核心是什么?有学者认为,

军事力量的构成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看权力如何运用,如军事效率,包括军事整合(Integration)、反应(Responsiveness)、军事人员技能(Skill)和军事装备质量(Quality),其中文化、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军民关系、国家间竞争关系、全球规范和国际组织等结构性与单元性军事活动等要素都会影响一国的军事效率(见表1),从而影响一国的权力运用。

表1 影响军事效率的因素分析

独立变量的影响	军事活动的影响	高军事效率的特点
文化	战略分析过程	军事整合程度
社会结构	采购	军事反应速度
政治体制	战略指挥与控制	军事人员技能
军民关系	情报与国内监控	军事装备质量
国家间竞争关系	军官的选拔、晋升与轮换	
全球规范	战术指挥与控制系统	
国际组织	培训与教育	

Source: Risa A. Brooks and Elizabeth A. Stanley, eds., *Creating Military Power: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Effectiven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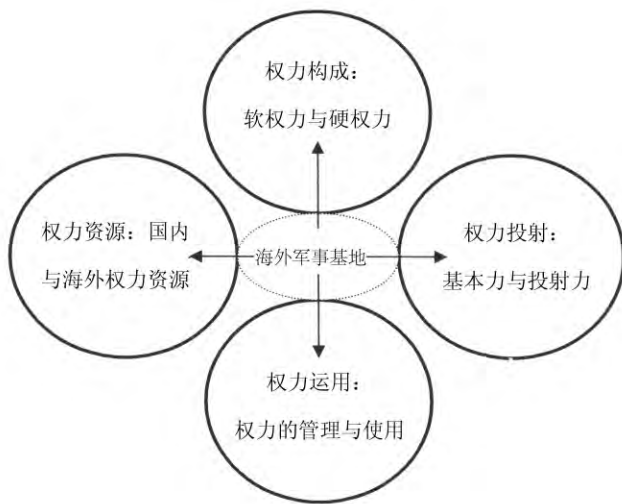
本文认为,海外军事基地也影响一国的权力运用,从而影响国际权力。一方面,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为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正如大卫·格鲁拉(David Galula)在《反暴乱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中所指出的:海外驻军比部署在国内的军队机动性更强。驻扎在他国土地上的军队更了解当地民众和情况,而临时派往战场的军队往往对当地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部署海外军事力量往往是战争胜利的前提;纵观历史,国际危机爆发的地区往往都是美国事先没有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地区。^[30]“9·11”以来,随着外交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外延不断扩展,军事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美国国防部成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军事基地成为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海外军事基地使一国管理和支配军事力量的过程复杂化。能否有效管理一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决定了其海外军事基地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例如,1947年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军事基地协定,此后美国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克拉克分别建立海军与陆军基地。作为补偿,美国向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但是菲律宾国内主流舆论反对在菲建立军事基

地,原因之一是驻菲美军事上享有“治外法权”,菲律宾政府无权对驻菲美军罪犯进行审判,使驻菲军事基地成为“国中之国”,菲律宾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严重损害。此外,美国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占地超过13万英亩,在苏比克湾军事基地的占地超过6万英亩,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31]随着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20世纪80—90年代反对美国驻军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正如菲律宾学者所言,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成为“罪恶之城”,卖淫、赌博、性病、黑市、商品走私、贩毒、敲诈勒索等社会问题严重。^[32]冷战时期美国在菲律宾、南越的军事基地,以及冷战后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均出现政治化,成为影响美国与东道国关系的障碍,影响了美国的权力运用,也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大打折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海外军事基地对国家权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不仅影响权力资源与权力构成等相对静态的因素,而且影响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等相对动态的因素,海外军事基地规模越大,基地使用国的权力资源就越多,其硬权力就越强,投射力就越大,权力的运用就越复杂;海外军事基地规模越小,基地使用国的权力资源就越少,其硬权力就越弱,投射力就越小,权力的运用就越单纯(图2)。

图2 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主要考察了海外军事基地对一国权力大小的影响,认为影响一国国际权力的因素主要包括权力资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和权力运用四个层面。海外军

事基地是一国重要的海外权力资源;海外军事基地的规模和素质直接影响一国的硬权力构成;海外军事基地是增强一国军事投射力的重要力量;海外军事基地使一国的军事管理和权力运用过程更加复杂,因而海外军事基地渗透到权力的四个要素中。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一国的权力大小主要由四个因素构成,权力是个立体多维的范畴,既存在于静态的结构中(权力资源和权力构成),又存在于动态的关系与实践(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二军事力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海外军事基地影响上述权力构成四个因素的所有方面,是判断一国权力大小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之一;三是国家在全球关键地区地部署与海外利益保护相称的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投射能力产生至关重要影响。当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对部署国权力投射能力的影响载体、程度和范围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 [1] [8] 参见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2] 曹堂哲:《基于不同哲学基础的权力理论探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9页。
- [3] 波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页;谷志军、晏妮:《当代西方权力力量主要论争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第106页。
- [4] Nicholas J. Spykman, *The America's Strategy and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 11.
- [5] 武铁传:《论软权力与硬权力的辩证关系及意义》[J],《理论导刊》2009年第5期,第23页。
- [6] George Marion, *Bases & Empire: A Chart of American Expansion*, New York: Fairplay Publishers, 1949, pp. 15-17.
- [7]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0 Base-line*, 2010, p. 20.
- [9] Jeremy Pressman, "Power without Influenc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4, 2009, p. 170.
- [10]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Boulder: Westview, 1975, p. 35.
- [11] Kent E.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Comparative Ba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Glob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

- [12]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M], 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第804—805页。
- [13] John Woodliffe, *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cations, 1992, p. 84.
- [14] [31] George K. Tanham and Alvin H. Bernstein, *Military Basing and the U. S. /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89, p. 36; pp. 120-121.
- [15] James Rogers and Luis Simon, "The Status and Location of th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 fo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olicy Department External Policies*, February 2009, p. 9.
- [16] Robert E. Harkav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 Overseas Bases: the Geopolitics of Access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p. 1.
- [17] [26]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 S. Military Overse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 p. 238.
- [18] Robert E. Harkavy, *Strategic Basing and the Great Powers, 1200-20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67.
- [19] Robert E. Harkavy, "Thinking About Basing", in Carnes Lord, ed., *Reposturing the Force: U. S. Overseas Pres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 2006, p. 12.
- [20]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pp. 22-23.
- [21] Paolo Enrico Coletta and K. Jack Bauer, *United States Navy and Marine Corps Bases Oversea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5, p. vii.
- [22] Joseph Gerson, "Ten Reasons to Withdraw All US Foreign Military Bases", *Peacework*, Issue 372, February 2007, p. 1.
- [23]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9-60.
- [24] Richard F. Grimmet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Objectives in the Mediterranean*, Washington D. C.: GPO, 1977, p. 5.
- [25] Mark L. Gillem, *America Town: Building the Outposts of Empi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p. 17.
- [27]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p. 4-5.
- [28] 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的软力量的观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6—9页;蔡拓、杨昊:《试析“硬权力”困境》[J],《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52页。
- [29] 2004年中国学者黄建国在《军事软权力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军事软权力”概念,实际上讨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参见徐鸿飞:《软权力视域下的军事软权力理论探析》[J],《鲁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第35页。
- [30] Thomas Donnelly and Frederick W. Kagan, *Ground Truth: The Future of U. S. Land Power*, Washington D. C.: AEI Press, 2008, pp. 89-90.
- [32] Roland G. Simbulan, *The Bases of Our Insecurity: A Stud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Balai Fellowship, 1983, pp. 251-253; Patricia Ann Paez, *The Bases Factor: Realpolitik of RP-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CSIS, 1985, Introduction.

作者简介: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4-06-04

修改日期:2014-07-18

CONTEN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Russo-American Rela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erspective

by Huang Dengxue

The fe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American rel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s the alternation between detente and tension, dialogue and confrontation, which has deep-rooted systemic reason. At the global level Russia and the U. S.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on the questions of strategic stability, non-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and energy,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e in Europe, Central Asia, Post-Soviet space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ased on the military-political logic of mutual nuclear deterrence an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and the absence of substantial contents in the relation, Russo-American relations are of great uncertainty of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 A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Contemporary Global Poverty Assessment

by Xiang Qingshan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e need first ass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lobal poverty accurately and objectively. The World Bank's practice of basing on family incomes and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s workable and is the accepted method at present. But this method lacks a kind of specific idea about poverty, and also can't reflect poor people's consumption features. The criterion of necessities in life and the criterion of internal capabilities are based on specific idea of poverty, so the demand for poverty assess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orld Bank. But because of some kind of defects, these two criteria face more serious problem in operation. A better assessment program about global poverty should use the World Bank's existing method as basis and absorb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the criteria of necessities in life and the internal capabilities, so as to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lobal poverty more precisely.

15 India's Arctic Policy and Sino-Indian Arctic Relations

by Guo Peiqing & Dong Limin

Although India is located on the subcontinent of Southern Asia, far away from the Arctic, out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eeking great power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actively sought to participate in Arctic affairs. This article first starting from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trategic needs offers the reasons for India's looking to the north, pointing out the country's four major interests affected by the changing of the Arctic. Then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in India's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cerning the Arctic affairs. The China-India cooperation on Arctic issues is also analyzed and discussed.

22 The Impact of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on the User Nation's Power

by Sun Degang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power theory usually follows dichotomy and divides power into hard vs. soft power, tangible vs. intangible power, indented vs. non-indented power, etc., and therefore power is mostly viewed as being "static". That apparently ignores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 of power itself, and moreover, disregards the factors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power measurement. This paper divides power into four interlinking and dynamic layers of power resources, power composition, power projection and power usage,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oversea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on user nation's power.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first, power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consisting of not only the static elements of power resource and composition, but also the dynamic elements of power projection and usage; second, oversea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exerts an essential impact on all the four layers; and third,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if located buted in key areas, will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wer aggrandizement.

Theoretical Probes

29 From Community Method to Union Metho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Governance

by Zhu Guichang

Community method featured with its supranationality has been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s and has been questioned from all side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However, Union method with the emphasis on coordinated action by the member stat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in the process of addressing the crisis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mode of strengthening Eurozone governance and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governance.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community method to the new union method has taken place in times of crisis, it is not a temporary move and it signifies the new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governanc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35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Prote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by Chen Jimin

With the expansion of overseas interests,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se interest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 terms of safeguarding overseas interests, China has made many efforts, such as buil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signing overseas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s, improving consular protection institu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These measures are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overseas investment interes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ut meanwhile, it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tect overseas investment. Furth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on enhancing six kinds of capabilities, namely the abilities of integrating diplomatic resources, improving agency coordination,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building, enhancing emergency response, raising the ability of military ac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ability of image-building. On this bas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path of overseas investment prote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1 India's Perception Change and Careful 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Based on the Important Report Titled 'Nonalignment 2.0'

by Wu Lin

Marked by an important report titled "Nonalignment 2.0" published in 2012, Indian elites and government began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s and policy toward China. Since 2013, in response to China's rapid rising, India has started to strike a careful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rder and strength, in handling border crisis,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look east strategy'. India's new government would not make a substantial adjustment to its China strategy, but may increase involvement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become more active diplomatically, which means both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Therefore, China should enhance India's position in it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narrow the gap between each other's demands, and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t multiple levels.

World Economy

46 Influence of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gotiation on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by Cong Lixian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gotiation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PP IPR negotiation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 text for negotiation is rich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embracing, Americanization and well ahead of time. The rules of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e mutual inheritanc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with TRIPS and ACTA. It will have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 the TPP IPR negotiation, we should adopt an open attitude, mak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ules, stud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